

全面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活力和底气

张晓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沉着应对，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8%；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5.3%，二季度增长4.7%，三季度增长4.6%。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要结合我国发展阶段转变和国内外环境变化，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认清大势、正视困难，坚定信心、积极应对，更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长期稳定发展有潜力

潜在经济增长率被广泛应用于分析研判一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一般来说，影响和决定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包括人口数量、劳动参与率、资本存量、技术水平等。新时代以来，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变化，我们党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发展站在了更高历史起点上，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更为丰富，能够为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人口数量和质量红利仍具优势。人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具决定性力量。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充足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2023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接近9亿，劳动参与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属于较高水平，青年劳动力数量稳中有增。实施延迟退休改革，将提高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提升劳动力供给潜力和质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也不断提高。2023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1.05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超过2.5亿。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推动我国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国人口流动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日益活跃，提高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并不断优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投资增长仍有巨大潜力。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其质量、效益、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存量资产。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较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基础设施、城镇化、保障和

改善民生等领域仍有巨大投资空间。比如，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加大在防灾减灾、农村养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资来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增强乡村发展活力；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有序推进城市更新、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离不开创新和优化投资机制、鼓励各类资本提升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比例；等等。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能够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研发投入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由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上升到2024年的第十一位，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科技创新持续赋能生产力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比如，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工业互联网实现了工业大类全覆盖，培育了421家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大飞机、新能源汽车、高速动车组等领域示范工厂研制周期平均缩短近30%、生产效率提升约30%；钢铁、建材等领域示范工厂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碳排放减少约12%。2023年，我国三（新产业、新业态、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7.73%，比2016年提高2.4个百分点。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将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充足动力。

高质量发展有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质量提升。10月份，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持续显效，消费、服务业、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明显回升，社会预期持续改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升，高质量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

企业活力进一步迸发。企业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

者，企业活力代表着经济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国有企业不断做强做大，规模实力和质量效益明显提升，核心功能不断增强，中央企业在航天、深海、能源、交通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在关键材料、核心元器件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着眼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提出增强各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等，将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民营企业数量明显增多，创新水平持续提升，成为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2019年以来，我国高新技术领域新设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均在九成以上，出口的自主品牌产品中66.4%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在202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超过10%的企业175家，414家企业的关键技术主要来自自主研发与研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加强产权执法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这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增强民营经济发展韧性。

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地方积极性积极发挥。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既需要整体层面的战略谋划，更需要具体落实的灵活创新。积极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各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能够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国上下竞相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和强大合力。近年来，党中央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始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发展目标、政策体系和考评标准，为各地区各部门提供工作依据和遵循，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整体性和有效性。同时，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结合实际探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并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支持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有效引导社会预期，增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形成各地比学赶超、立足自身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局面。

稳增长防风险有底气

当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增多。但要看到，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同时，我国发展有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这为我们稳增长、防风险提供了充足底气，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经济运行整体效率。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更好发挥市场调节功能、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资源配置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当前，着力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将进一步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竞争格局，促进各个地区、各类企业在公平良性竞争中实现更好发展。

宏观政策空间仍然较足。宏观政策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近期，党中央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难点问题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这些增量政策坚持长短结合，强化协同创新，强调统筹协调和系统集成，既重视发力解决当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更重视解决经济中长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只要把握好政策实施的时度效，就能进一步放大组合效应。同时，结合谋划明年经济工作，研究储备一批稳经济、促发展的政策举措，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推出，将进一步夯实质量发展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释放更多红利。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有利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比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这有利于准确刻画全国、地方和各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同时揭示主要经济活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展现国民财富及其部门分布状况信息，把经济增量分析与存量分析、总供给分析与总需求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将进一步增强宏观经济分析能力、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提升政府宏观治理水平、防范化解经济风险。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稳扎稳打，有步骤、有重点地抓好各项改革任务落实，将积小胜为大胜，释放更多改革红利，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效应。

（《人民日报》）

司法护航绿色发展 为美丽张家界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陈建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赋予环境资源审判工作重要使命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近年来，张家界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围绕服务保障省委三高四新战略，市委建设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目标，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保护辖区生态环境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

一、扛牢政治责任，筑牢绿色发展屏障

提升政治站位，明晰职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张家界法院始终学思践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准确把握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战略要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审判自觉、法治自觉为地区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聚焦主责主业，力推生态法治。张家界法院始终坚持最严法治理念，探索绿色审判机制，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审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坚持损害赔偿、全面赔偿原则，严格执行民法典中的绿色原则和绿色条款，妥善化解环境资源民事纠

纷。强化行政监督职能，发挥环境资源行政审判对于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作用，司法助力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履职。强化公益诉讼职能，依靠诉前磋商、司法确认等优势，支持检察机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保护生物多样性，助推生态安全。张家界作为全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全国第一个以大鲵及其栖息地环境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张家界法院坚决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设立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资源及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基地，筑牢国家保护动物主要分布地的司法保护网。依法严惩滥捕滥杀等重要水体的非法捕捞、非法采砂、非法排污违法犯罪案件，切实保护好母亲河。

二、发挥审判职能，强化绿色司法辐射效应

打造专业化审判机制。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法治保障，绿色司法是生态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张家界法院始终加强专业化审判能力建设，严格落实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求，探索惩罚性赔偿、全链条追责、生态环境损失整体性认定等裁判规则。发挥澧水环境资源法庭审判职能作用，实行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审判方式。持续完善环境资源审判辅助体系，建立健全技术调查官、专家人民陪审员制度，形成环境资源保护合力。

创新生态修复方式。发挥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金鞭溪茅沿河等生态环境司法修复基地作用，持续推进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执行机制。设立生态修复资金专项账户，将生态赔偿款项用于水体整治、植被改善等，灵活运用增殖放流、劳务代偿、补种复绿等责任承担方式，推动恢复性司法裁判落到实处。积极探索环境资源责任承担方式，通过分期付款、环境保护禁令等方式，既依法严惩企业排污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又兼顾企业发展需求，实现双赢共赢效果。

锻造过硬司法队伍。环境资源审判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特点，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张家界法院严格按照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要求，一体推进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建设，引导干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压实院长审判监督管理责任，院庭长带头办理环境资源案件。全面提升法官队伍运用法治答问、案件评查、业务技能培训、院校合作、以老带新等多种方式，着力培养环资审判法官庭审驾驭、法律适用、文书制作、群众工作等综合能力。

三、深化协同治理，力促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坚持协作联动，汇聚保护合力。突出内部协作，围绕保护澧水流域生态环境目标，与常德中院、湘西中院签订《澧水流域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

作框架协议》，完善环境司法查询、送达等司法措施以及案例研讨、司法宣传等方面的常态化协作机制。突出外部联动，主动融入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中，加强与公安、检察等部门沟通，建立健全工作联动、矛盾联排、纠纷联处机制，织密司法保护网络。加强与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协作，实现环境司法与环境执法的无缝对接、高效衔接、双向链接。

做实司法建议，堵塞治理漏洞。将标本兼治思维融入审判执行工作中，主动对接绿色发展需求，善于从审判看全局、以审判促治理，深挖环境资源类案件、重点生态区域保护中高频涉诉问题。2024年以来，全市法院先后向河长办、乡镇街道等部门发出司法建议9份。大力实施精品案例工程，持续发布《张家界法院生态环境司法状况和十大典型案例》，打造更多环境资源审判的精品案例。强化普法宣传，营造浓厚氛围。积极邀请代表委员、社会公众旁听庭审，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环境资源司法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常态化开展环境资源审判六进活动，充分利用法院开放日、世界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节点，通过现场普法以案释法等方式开展宣传，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法治理念。

（作者系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核心提示：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和湘鄂川黔军区在大庸县（今张家界市永定区）永定镇天主堂里宣布成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 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红军长征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党中央策划战略转移长征，创立新苏区战略意图的成功实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在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中起到了重大作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胜利，是整个红军长征胜利的标志这三个方面，论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

张兵

李庆芳

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壮举。1934年11月，正当中央红军刚刚开始长征，还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中时，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湘鄂川黔军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庸县城（今张家界市永定区）宣告成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自此，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张家界市桑植县刘家坪、瑞塔铺突围长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奋战，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红军长征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并以此纪念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90周年。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党中央策划战略转移 长征，创立新苏区战略意图的成功实现

1934年7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益危急，中央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没有可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策划战略转移，准备退出中央苏区。为配合这一重大的战略行动，中央首先派出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突围远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7月23日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下达了红六军团准备突围到湖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训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训令》详尽分析了六军团到湖南去创立新的苏区的必要性及客观条件：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省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而且湖南中部敌人力量之极端薄弱及(有)一般良好的条件。《训令》同时批评了二军团在湘西北行动的消极路线，因为中央红军初期战略转移，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计划，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队伍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尽管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根据实际情况，没有在湘中创立根据地，而是创立了以湘西北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但仍不负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战略意图的实现，而且，更好地完成了这一战略决策的任务和目的。任弼时曾于1935年1月和9月两次谈到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策划战略转移的战略决策。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入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

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可见，红六军团突围的目的是要与当时在湘鄂川黔边区活动的红二军团(当时改为红三军，待与红六军团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取得可靠的联系，创立新的苏区；是中共中央策划战略转移、创立新的苏区总战略中的一步棋。但在这个《训令》中，对红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的意图，并未全部透露。战争实践证明，中央不仅是要红六军团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和联络红三军，更重要的是要红六军团起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先遣队作用，试探中央红军主力突围的路子，以便中央红军在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条安全的行军路线，因为中央红军初期的战略转移，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计划，是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队伍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尽管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根据实际情况，没有在湘中创立根据地，而是创立了以湘西北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但仍不负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战略意图的实现，而且，更好地完成了这一战略决策的任务和目的。任弼时曾于1935年1月和9月两次谈到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策划战略转移的战略决策。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入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

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持久战斗当中，我二、六军团在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战略意旨下转移到湘鄂边地区，最基本的任务是：第一，以自己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在敌人翼侧和后方活动，达到分散吸引敌人用以进攻和追剿我中央红军的兵力；第二，在尽可能地保存、巩固、壮大红军有生力量的条件下，坚决进行战斗，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卫扩大新开辟的游击区域，使之成为巩固的新根据地，贯通江西、四川两大基本苏区。

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在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失败。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8.6万余人开始实行战略大转移 长征。而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前堵后追，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掉。中国革命到了最危急关头，10月24日会师的红二、六军团，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就是立即实施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威胁，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湘西北地区位于湘鄂川黔四省边界，敌人兵力不多，战斗力不强，又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之一，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红二军团曾在此长期战斗过；地理条件也非常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崇山峻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略上，这一地区是当时正在围追堵截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的敌人侧翼，且游击战争一旦发展，直接威胁湘、鄂两省的中心长沙和武汉，因而，创建以湘西北为中心区域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既能迅速有效地达到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又能给刚刚结束突围西征浴血奋战的红六军团和长期疲惫游击的红二军团一个休养生息、巩固发展的机会。

1934年10月底，红二、六军团发起了著名的湘西攻势，并一举攻下永顺县城，取得了十万坪大捷，歼敌2个旅、俘敌2000余人、缴枪2200多支。随后又相继攻占了大庸县城、桑植县城、进袭辰州(沅陵)，包围常德，占领桃源，游击益阳，进而威胁长沙，吓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急令正在湖南截击中央红军的3个师，兼程北调，回援常、桃，并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兵救援。正如朱德代表中革军委在12月20日给红二、六军团的指示电所说：因我二、六军团的积极行动，何敌正调动约4个师的兵力向你们前进。任弼时1935年1月6日在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会议上说：特别是我们进攻辰州，包围常德，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的行动。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始终牢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努力调动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到自己身边来，减轻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的压力，正如任弼时在湘鄂川黔省委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这块苏区在整个战线上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整个战线上一个前进(沿)阵地，同时又是进攻中央野战军（即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主要敌人的侧后方，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这个新根据地。大踏步地开展这块苏区，牵制分散敌人，袭击敌人的后方，来动摇敌人的整个阵势，直接帮助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迅速取得决战的胜利。若是我们在这个战线上不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或者是失败了，那便要影响整个战线，使其它战线方面增加一些困难，这是我们应该清楚看到的。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一起，经过半年多的转战，胜利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六路围剿，在整个反围剿战斗中，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共吸引和牵制了敌军主力86个团、10万多人，包括敌方部队共计20多万人，歼敌2万多人，其中俘敌8千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特别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非常危急的情况下，破坏了敌人全力追击中央红军的计划，起到了策应中央红军穿插于云、贵、川边的重大作用，任弼时曾对胜利的意义作过高度概括：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牵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胜利的汇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下转8版)